

26-14



地下党员李喇嘛

中共永靖县委党史办公室编

地下党员李喇嘛

中共永靖县委
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十月

序

牙含章同志撰写的《陇右地下斗争》一书中，曾多次写到了永靖县的“李喇嘛”。为了弄清楚李喇嘛的一生，我们奉上级指示，采取派人出访和征集资料相结合的方法，对李喇嘛的革命活动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在此基础上，整理编印这册《地下党员李喇嘛》。通过这本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李永发同志为了党的事业，以喇嘛为职业掩护，对渭源地区地下党的建设和人民游击战的活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尤其是“仅李喇嘛一人在渭源地区发展党员达一百多人”，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能够作出这样显著的事迹，是十分可贵的，也是令人敬佩的。李永发同志的一生，成绩是主要的，而且是很大的。因此，中共永靖县委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作出了“关于恢复李永发同志党籍的决定”，这样，才真正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解放前的永靖人民中，李永发是参加革命最早、成绩最大的一位好同志。历史本身就是生动的教科书。今天，我们怀念李永发同志的最好愿望，就是希望把《地下党员李喇嘛》这本资料作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良好教材，对全县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们进行一次生动的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的教育活动，以振奋精神、开发永靖，把祖国的四化事业搞好，为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而奋发拼搏。

黄生祥

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

目 录

李喇嘛的革命生涯..... (1)

走出寺院 参加“民变”

参加地下党 发展地下党员

参加游击战 壮大游击队

缅怀李永发同志.....牙含章 (11)

我所知道的李喇嘛.....杨子俊 (16)

怀念李永发同志.....黄生祥 (19)

后 记..... (20)

李喇嘛的革命生涯

——记李永发同志在陇右地下斗争的活动片断

在渭河发源地的渭源县的七圣乡、清源乡的山庄村舍里，广大农民群众至今仍怀念着李喇嘛在地下斗争中的革命事迹。

走出寺院 参加“民变”

一九四三年春，在甘肃南部暴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有近十万汉、回、藏、东乡等民族联合的农民武装暴动。这个闻名全国的“甘南民变”，在陇右地区坚持斗争达十个月之久，终因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坚强的领导核心，加之国民党的血腥镇压，使气势磅礴的“甘南民变”终于失败了，但在陇右历史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斗争篇章。

在这支起义大军中，活跃着以渭源县青年农民夏尚忠率领的一支武装，内有一个与夏尚忠结为生死之交的伙伴李喇嘛。当时，李喇嘛在渭源县五竹寺从事佛教活动，因不堪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毅然走出寺院，参加到“甘南民变”的战斗行列，他与夏尚忠并肩战斗，自始至终生活在一起。这个李喇嘛，他的原名叫李永发，当了喇嘛以后，群众称他为李喇嘛，寺院中的经名叫李太来，在陇右地区参加地下党以后，他的化名又叫李荣发、李云发、李青山。他于一九一五年出生在永靖县白塔乡（现迁西河乡）红庄湾村，

自幼性情强悍，又因家境贫寒，从七岁开始，曾在永靖县白塔寺荣法台学传佛教经艺，以后又分别在民和县宏化寺、兰州上沟寺、渭源县五竹寺等地从事游僧活动。

“甘南民变”失败后，李喇嘛因参与民变的身份暴露，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注意和五竹寺老喇嘛的不满，因而他离开了五竹寺。此时，夏尚忠和李喇嘛，也随同失败后的大部分领导骨干一起在陇右地区纷纷转入地下斗争。这些人，继续手持武器，是“民变”失败后，保存下来了一支比较坚强的革命力量，属于夏尚忠及其李喇嘛带领的地下武装，当时他们仅有近二十支长、短枪支。有一次，敌军一百多人在夜间突然包围了夏尚忠、李喇嘛等三人住的“窝子”（即一户可以信赖的住宿农家），如果硬打硬拼，非吃亏不可，只有连夜冒险突围。在突围时，夏尚忠的臂部中了一弹，负了重伤，在另一个“窝子”休养了将近半年，才算痊愈。就这样，这些民变失败后的骨干们，继续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坚持着长期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

这些“民变”失败后的骨干们，他们有家不能回，有嘴无饭吃，一无路费，二无生活出路，处境是极端艰难困苦的。但他们依然进行着打击土豪劣绅和强下伪军枪枝的活动。一九四五年秋，夏尚忠带着十几个人，在阳坡磨村截获处死了渭源县便衣队的两个特务张有福、唐万胜。一九四六年腊月，夏尚忠、李喇嘛、王得录等二十多人，又把莲峰镇的大土豪侯巨卿处决了，并搜获步枪十多支，手枪一支和几百元白洋。

就这样，李喇嘛跟随夏尚忠一起，与“甘南民变”起义失败后的骨干成员组成了一支武装力量，在白色恐怖的严密

笼罩下，于渭源、陇西一带坚持了武装斗争达四年之久（从1943年初至1946年底），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代价。

参加地下党 发展地下党员

一九四六年，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重建后的甘肃工委派高建君（化名方刚）、牙含章（化名康明德）和万良才（化名杨重义）三同志组成“甘南民变工作委员会”（简称甘南工委），深入到陇渭地区，主要执行两项任务：（一）、领导陇渭地区党的组织；（二）、调查甘南民变的真实情况。从此，党领导的陇右地下斗争，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一九四六年底，高建君、牙含章、万良才三同志遵照中共甘肃工委的指示，到达陇渭以后，首先在“民变”失败后幸存下来的骨干成员和贫苦农民中物色发展党员。因为这些人，对国民党反动派最恨、遭受旧社会压迫剥削最重，因而对共产党也最爱，斗争起来也最坚决。同时，因为这部分人中掌握了一些武装；而这些骨干们也从失败的惨痛教训中觉悟到，只有投靠共产党，斗争才有希望。一九四七年农历二月初二，正式成立了“陇渭支部”。同时，决定由牙含章同志在渭源寻找夏尚忠，做好党的组织宣传工作。过了几天，牙含章同志就在一个“窝子”里找到了夏尚忠和他的伙伴李喇嘛。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教育和考验，由牙含章介绍，夏尚忠、李喇嘛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共陇渭支部成立后发展的第一批党员。

李喇嘛自从离开了渭源五竹寺院以后，就在清源乡、七圣乡一带山区，表面上从事插牌保山、念经拜佛之类的民间

迷信活动，暗地里却与夏尚忠一伙结成了农民武装。他们打富济贫，抗粮反霸，得到了贫苦农民的赞助。自从他加入地下党以后，身怀满腔的爱国激情，处处事事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以“喇嘛”为合法身份，利用群众的迷信形式，掩护地下党的活动，积极发展党的组织。他与群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结识了大量的知心朋友，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白天求神祈雨，黑夜走村串户，进行党的秘密活动，昼伏夜行，或侦察敌情、或入党谈话、或开会行军，活跃于广阔的陇右山区。

一九四八年秋，随着组织扩大和斗争需要，陇渭支部正式改组为陇右工委。这个陇右地下党领导机构，坚持实行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以工委委员和专职工作人员为主，组织了三个精干隐蔽的武工队，分片进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和开展武装游击战的活动。其中的一个武工队就是由陈致中（前期是牙含章）、夏尚忠、李喇嘛（李永发）等人组成，以渭源地区为据点，分工负责这一带几个县的工作，直接领导这一片的各个党支部，实际上起到了中心县委的作用。

由于李喇嘛废寝忘食、日夜奔波的认真工作，得到了中共陇右工委的充分信任和支持，担任了党的通讯联络和组织发展工作，成为一个专职的党务工作人员。他在一九四七年春入党起，到一九四九年秋渭源解放时的三十多个月中，先后在清源乡、七圣乡等地发展了地下党员一百多人，约占渭源县解放时地下党员一千人的百分之十。同时，他还给不少入党对象作过入党的审查谈话工作，忠实认真的履行了他作为党务专职干部的崇高职责。当时，要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恐怖气氛中秘密发展党的工作，随时都有被捕杀、活埋的危

险，但李喇嘛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他以自己独特的“活喇嘛”身份，用参加群众的迷信活动作掩护，大胆进行党的秘密工作。当时，要在贫苦农民中发展党员，他首先对发展对象的家庭情况、经历、社会关系、政治态度等作详细地调查了解，特别是对以国民党的政治态度为分水岭，对入党对象采取登门拜访和互相谈心或叫到某个保密地点作个别谈话等方式，对发展对象进行有关党的知识的教育，一般他能从党的最低纲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和“穷人闹革命、闹翻身”、“打土豪、分田地”以及建立新中国、农民有饭吃、工人有工做等等谈起，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党员思想状况的提高，逐渐给党员增加“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党性教育，使入党的对象具备了决心为党的事业而献身的觉悟时，才能吸收为中共地下党员。入党时，一般都要举行庄严的宣誓仪式和严格的保密教育，并反复嘱咐新党员三件事：一是记住入党的日期、地点和候补期；二是记住入党介绍人；三是记住保守机密的宣誓词。就这样，李喇嘛介绍了大批贫苦农民入党。当时正在读书的青年学生杨子俊同志入党宣誓后，李喇嘛对他严肃地说：“你还年青，入了党，就是党的人了，你害怕吗？你要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杨子俊同志斩钉截铁地回答：“只要能为推翻三座大山而献身，就是死了，也是光荣的”。李喇嘛听了以后非常高兴，他还一再叮咛杨子俊说：“地下党员的活动是没有保障的，一旦被捕，谁也不能叛党，出卖同志”。这些生动有力的教导，杨子俊同志至今仍然牢牢记在心中。

李喇嘛，这个有着特殊身份的地下党员，以他对党特有的耿耿忠心，为党的事业不知疲倦地战斗着，他工作不讲条

件、行动不分昼夜，常年累月地在渭河源头的山区，跋山涉水，日夜奔忙，出生如死，从不怜惜自己。一九四八年寒冬的一个深夜里，李喇嘛与牙含章、夏尚忠一起从七圣山区走出，天黑的象个锅底，伸手看不见五指，他们这些地下党人又习惯于夜间走的羊肠小道，一不小心，把李喇嘛失足跌到路边一个小窟圈里，约有两、三人深，牙含章、夏尚忠一时急的束手无策，只得跑到附近的一个地下党支部书记申云山同志家里去叫人。当时，地下党的另一个支部书记李福林，也正好在这个“窝子”里，就由他叫了几个人，拿了一条大麻绳，把李喇嘛从深坑里搭救上来了。在当时，这些地下党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昼伏夜行，过惯了一种特殊环境里的“夜生活”，所有行军、转移、开会、找人谈话等等活动，都是在夜间进行，而大白天，则多半是隐蔽或休息。

李喇嘛闹革命，机智胆大、意志坚强，正如牙含章同志说的，李喇嘛自一九四七年入党后，“积极为党工作，在建立渭源地下党方面是有贡献的”。

参加游击战 壮大游击队

陇右地下党一开始就与民变失败后的地下武装活动结合在一起，而开展武装斗争的，否则就不可能生存和发展。正如毛主席曾经说过的：“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因此，陇右工委把武装斗争提到了生死存亡的首要地位，“每天都是把自己的脑袋提在手里。”他们在国民党残酷统治的斗争环境中，总结出了一套“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经验，创造出两种适合的组织形式：一种是

长期存在的精干隐蔽的完全脱产的游击队，即由领导人员组成的核心队伍，实质上是一支武装工作队（武工队）；另一种是不固定的、时出时没的由年青力壮的农民群众临时组织起来的不脱产的游击队。这后一种游击队，是由前一种武工队领导的。通过将近三年的艰苦斗争，这支游击队不仅打击了当地土豪恶霸的反动气焰，鼓舞了陇右人民的革命士气，解决了陇右地下斗争的枪支弹药和活动经费，更重要的是训练了一批游击战争的优秀干部，不仅使我们党在陇右地区牢固地站稳了脚跟，而且使游击队从小到大地发展了起来。

李喇嘛作为当时陇右工委的专职党务工作人员，他不仅在积极发展地下党的同时，总是战在武装斗争的最前线，勇跃地参加游击战的活动，由夏尚忠、李喇嘛和牙含章（一九四九初调为陈致中）三同志组成精干隐蔽的武工队，以渭源地区为中心据点，把领导发展地下党和开展武装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活动。

奉高健君、牙含章同志的指示，夏尚忠派人联系，于一九四六年腊月十二日，把藏军司令肋巴佛接到了渭源县。第二天晚上，夏尚忠、李喇嘛与肋巴佛见了面，送给了肋巴佛一支手枪，畅叙了他们参加“甘南民变”中结下的战斗友谊，介绍了党给陇右人民带来的黎明曙光。

原会川县东部的张集寨村，有个恶霸地主王存福，外号“油葫芦”，与他的大儿子王麻子横行乡里，压榨剥削，为人苛薄，心计歹毒。广大贫苦农民对其十分痛恨，附近的地下党员向牙含章同志汇报了当地群众的要求。一九四七年下半年的一次陇右工委会议上研究，决定组织游击队对这个土豪进行一次打击，一则为贫苦农民出气，二则可以给地下

党筹措一笔活动经费，会议决定把这一任务交给夏尚忠同志组织执行。事先，夏尚忠派人进行了详细侦察和周密战斗布置，然后组织了由李喇嘛、王得录等十多人参加的游击队，由王得录指挥，牙含章、夏尚忠同志参加，于一九四八年正月的一天夜里，对土豪王麻子一家进行了致命的打击，缴获了大量的白洋、大烟，胜利地返回了渭源。

一九四八年清明节前后，夏尚忠、李喇嘛、王得录等七人，去陇西县双泉乡的一个山庄里，因夏尚忠在一个“窝子”里病倒休息了几天，不幸被敌人的密探发现了，当夜，敌人出动了一百多人偷袭包围了这个山庄。由王得录、李喇嘛二人把夏尚忠扶起，翻越后墙突围出来。有一次，李喇嘛路过锹家铺村边，不巧被国民党的自卫队跟上了，他们在后面追问李喇嘛是“干什么的？”李喇嘛没有理会，这更引起了敌人的怀疑，眼看着敌人快要追上来了，李喇嘛掏出手枪，边打边跑，把前面的一个敌人打倒了，吓得其他敌人也不敢前行了，趁敌人惊慌之中，李喇嘛飞也似的跑脱了。一九四九年农历四月初八，他与地下党员张耀武，被敌人扣留以后，从后墙上挖了个洞，机智地逃出了虎口，显示出李喇嘛聪明勇敢的斗争精神。

一九四九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向甘肃挺进，陇右工委认为这是大打游击战争的绝好机会，于是决定组成一支精干的“陇右人民游击队”。夏尚忠、王得录、李喇嘛等人踊跃报名参加。李喇嘛深入七圣山区，广泛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挨家逐户地动员了一百多名地下党员积极参战。几乎李喇嘛个人所发展的全部地下党员，都参加了人民解放战争。这支游击队在一、两个月内，就缴获了敌人枪支一千余枝，

并和平解放了陇西、渭源县城，最后，整个陇右人民游击队发展到两千多人，解放初，这支游击队正式编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胜利的曙光给人民带来了喜悦，人民解放了陇右，陇右大地到处是一片生机，在这令人欢心鼓舞的日子里，李永发（李喇嘛）怀着兴奋的心情，站在渭源县城的街头上，握手送别了与自己并肩战斗的游击队员，他也在此时此刻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被党光荣的分配到渭源县委组织部工作，完成了领导上交给的支前、征粮和地下党员登记整顿等具体任务。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旬，李永发按省委组织部的通知，调往当时的临夏地委，被地委组织部分配到永靖县工作，他于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一日到永靖县报到后，担任县委委员兼统战部长、农会主任。在此期间，他以满腔热情，积极投入到王台、川城、银川等边远山区的清匪、救济工作，又对民族宗教和反动会道门组织作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后因重病请了长假，离开了工作岗位，在工作上、生活上犯了错误，受到了过重处分，于冤狱中病故。鉴于李永发同志，“在解放前陇右地下党期间，为党做了一定工作，一九五一年因工作和生活上的错误被开除党籍的处分是过重的。”中共永靖县委根据党的实事求是原则，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作出了“关于恢复李永发同志党籍的决定”。

今天，我们搜集整理出的《李喇嘛的革命生涯》，仅仅记录了李永发同志在陇右地下斗争时期的活动片断，是他为党为人民尽忠尽职的几个生动写照而已，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李永发同志对党是忠诚的，工作是积极的，作风是朴实

的，尤其是在建立渭源地下党方面，他的贡献是不能埋没的。在陇右地下斗争的大地上，留下了他的战斗脚印。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象一切革命同志一样，李永发同志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失误，他出身于喇嘛，本身就带有某些旧社会的烙印，加入地下党以后，又处在残酷环境中，无法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加之对自己缺乏严格的约束，生活上失去检点，但他在陇右地下斗争的几年中，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努力奋斗的革命者形象，却永远铭刻在陇右人民心中。

今天，我们深切地怀念李永发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在闹革命时期的那种出生入死、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他艰苦奋斗、不怕困难的顽强作风，学习他忠心正直、不畏强暴的高贵品质。让我们以李永发同志的崇高精神，激励自己，奋发向上，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贡献力量。

缅怀李永发同志

牙含章

李永发同志逝世三十年了，最近，中共永靖县委党史办要编写一本纪念李永发同志的小册子，要我写一点关于他的革命事迹的回忆。我认为义不容辞。但不一定能满足党史办的同志们的要求。

李永发同志是永靖县人，是永靖县解放前唯一的地下党员，是永靖县最早的革命者，这是李永发同志个人的光荣，也是永靖县人民的光荣。

我是李永发同志的入党介绍人，又和他在一起工作、战斗、生活了约一年多时间，在现在还健在的中共陇右工委的负责人里面，我可以说还是比较了解他的。

我和李永发同志是在一九四六年冬，经过夏尚忠同志的介绍才认识的。夏尚忠同志是渭源县人，一九四三年“甘南民变”时，领导渭源县千余农民起义，参加了王仲甲领导的起义军，被任为团长，因此，渭源农民一般称他为“夏团”，又因为他是老大，又叫他“夏大”。

“甘南民变”失败后，夏尚忠没有向敌人投降，他把一部分枪枝埋藏起来，他个人则与毛得功、郭化如、杨友柏等同志结成一个新的核心，继续与国民党和马步芳的反动统治进行武装斗争，他们白天隐蔽，夜间活动，经常转移住地。一九四六年，他们派肖焕章和吴建威两同志进入陕甘宁边区。向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甘肃工委）汇报了“甘

南民变”的经过，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去领导他们进行斗争，中共甘肃工委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决定派高健君同志和我到陇右地区，帮助他们开展工作，总的任务是：建立地下党，建立游击队，建立游击队根据地。我们到了陇右地区以后，首先介绍郭化如、杨友柏、肋巴佛等同志入了党，随后就由他们介绍，与夏尚忠同志接上了头，并介绍他入了党。

我们与夏尚忠同志会面时，见到和他在一起活动的一位战友，年约三十余岁，穿着一身农民的服装，夏尚忠就向我们介绍，“他是李喇嘛”，也就是李永发同志，在渭源县的农村中很多人都知道“李喇嘛”，但不知他叫李永发。

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高健君同志和我决定把李永发同志作为发展对象，分工由我做他的思想工作，我先通过夏尚忠，了解了李永发的一般情况及其历史，然后直接与他进行了多次谈话，向他介绍了党的最高纲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和最低纲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介绍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需具备的条件，共产党员的权力与义务，党的纪律，并了解他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社会关系，对共产党的认识和态度等等。

根据我现在的回忆，他出身于永靖县一家贫苦的农民家庭，因为生活困难，他的父亲在他七、八岁时，就送到一所喇嘛寺出家当了喇嘛，学了一点佛经。实际上，他是被迫出家当了喇嘛的，并不是真正对宗教有什么信仰，因此，他不是真正的“宗教职业者”。由于喇嘛寺的生活并不好过，所以他长大以后，本着“和尚吃十方”的习惯，到各地的寺庙去混饭吃，辗转到了渭源县的五竹寺，在这里认识了夏尚忠，并参加了夏尚忠领导的渭源农民起义。起义失败后，他

又与夏尚忠密切结合，共同转入地下斗争，同吃同住，共同战斗，一时一刻也未分离过。他的经历说明，他是出身于贫苦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压迫剥削，反对国民党和马步芳的反动统治，是旧中国的一个坚决的民主主义革命者。

由于他有这一段革命历史，所以很快就接受了共产主义，表示热烈拥护共产党，并要求党接受他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经过高健君同志和我共同研究，同意他的入党要求。就由我和夏尚忠作了入党介绍人，入党时间大约在一九四七年，没有候补期，是作为“甘南民变”的忠贞战士对待的。

由于李永发曾以“喇嘛”的身份，在渭源县活动了多年，给许多人家“念过经”、“治过病”，所以他的接触面很广，认识的人很多，只要有人请他，他就去，能吃饱肚子就满足，并不要钱，因此他在渭源县的农民中，交了很多朋友，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一点非常重要。

首先，对夏尚忠转入地下斗争起了很大作用。这些农民家庭成了夏尚忠与李永发经常居住的“窝子”（是可以信赖的住宿人家），是夏尚忠的地下武装斗争能够坚持下来的一个重要条件。

其次，对后来在渭源农村中开展党的工作也起了很大作用。因为这些“窝子”几乎全是贫苦农民，其中又有很多人参加过“甘南民变”，这些人很自然的成了发展党员的对象。在渭源县解放前，我们在全县共发展了一千多地下党员，其中仅李永发同志介绍入党的就有一百多人。

再次，由于李永发同志有时也到土豪恶霸家中去“念经治病”，这对后来地下党领导的打土豪的游击活动，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李永发同志知道那些人家是当地最坏的土